

◎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

温暖的锋芒

——王兆胜学术自选集

王兆胜/著

WENNUAN DE FENGMANG
WANGZHAOSHENG XUESHU ZIXUANJ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温暖的锋芒

——王兆胜学术自选集

王兆胜/著

WENNUAN DE FENGMANG
WANGZHAOSHENG XUESHU ZIXUANJI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暖的锋芒：王兆胜学术自选集/王兆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004-9645-8

I. ①温… II. ①王… III. ①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50515 号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刘 娟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戴 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27.25
字 数 460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高 翔

副主任 王利民 余新华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利民 王兆胜 孙 麾 李红岩 余新华

范勇鹏 柯锦华 姚玉民 祝晓风 高 翔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序

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建社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1月创刊）迎来创刊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创刊）创刊一周年的特殊日子里，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诸同仁精选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汇集成这套《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出版了。这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科研人员呈现给自己单位的一份深情厚礼。

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始终坚持“编研结合”的方针，要求编辑人员结合自己的编辑工作，认真研究理论和学术问题，既要密切跟踪国内外学术前沿，又要准确把握本学科的学术历史；既要关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又要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形成自己的研究理念、研究风格和独到见解。正是浓厚的学术氛围、严谨的学术风气、深厚的学术积淀，使杂志社不同于一般的编辑机构，它拥有一支具有较深理论造诣和学术积累的科研队伍，推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主办的学术报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学术水平，在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洪流中，占有醒目而且重要的位置。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的关心和领导下，进一步加强对理论学术前沿的研究和引领，率先在全国期刊界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编辑室，建立了理论前沿研究中心，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份全国性哲学社会科学专业报纸《中国社会科学报》，完善采、编、发流程管理，大力实施“开门办刊”和“开门办报”方针，更加强调“编研一体化”，努力培养和造就一大批专家型编辑、记者，努力为推动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当代学术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这套学术文库，可以说是对杂志社编研结合办社方针成果的一次检阅。

尽管这部学术文库所收论著，既有离退休老同志的论文辑录，也有在职同志的自选集，还有青年同志的学术专论，但毕竟只是部分同仁的科研成果，未必代表杂志社工作人员的最高学术水平。当然，从其所涉领域、研究理路、学术风格中，人们能或多或少地体会到杂志社独特的学术视野和科研特色。

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充满挑战、异常艰辛的工作。在这里，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坚强的意志，没有经受挫折、百折不回的精神，是不可能做出任何重要成绩的。好在中国学术，具有源远流长的优秀学术传统，无论是从事编辑工作，还是从事科研工作，只要认真反思、体会、继承这些优秀传统，就能够获得一些重要的教益。

一是求是的传统，也就是追求真理、探索规律的传统。真正的学问家，从来都将认识人类之命运作为自己全部学术活动的出发点，力图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形态的反思，通过对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结论，即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事实上，高层次的学术活动，不但是严谨的，而且是思辨性的，充满了理性的睿智。

二是求真的传统。学术研究，就其直接目的而言，就是揭示和研究人类活动的各种形态。这决定了它必须将具体的事实作为自己学术立论的重要基础。明儒王阳明曾提出“五经亦史”的重要论断，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其言未必准确，但反映了中国学术注重事实、不空言义理的重要传统。学术的科学性，首先取决于研究者是不是在依靠事实说话。事实的论证，要永远重于空洞的说教。

三是经世的传统。这就是主张学术研究要服务国家，服务民族，做到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经世不但是研究目的，而且是一种道德，一种精神，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位卑未敢忘忧国”，以学问回报社会的高尚情操和庄严责任感。在中国传统社会，学术从来都以经世为其基本目的。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中，明确阐述了自己以史经世的学术主张：“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这就是说，注意人伦日用，关注时代需要，是章学诚治史的重要特征，也

是其以史经世的基本内容。正是经世的传统使史学在中国历代社会与政治变革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

环顾当今学林，中学与西学互动，传统与现代并存。然而，我们民族悠久、深远的优秀学术传统，仍是我们前进的基础和出发点，是不可或缺的智慧宝库。学术研究如果不以求是为目的，如果不关注、不探索社会演变的规律，以烦琐考证取代理论思维，以堆砌资料为博，以叠床架屋为精，拾芝麻以为玃珠，袭陈言而自诩多闻，以偏赅全，见小遗大，学术就注定要丧失自己应有的精神境界，在由无数具体事实堆积而成的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一旦如此，其着力逾多，其离科学精神所追求的境界愈远。但另一方面，如果缺乏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缺乏对规范的必要尊重，脱离实际，游谈无根，空言“义理”，或以一偏之见为理，或以望文生义为理，或以自逞胸臆、杜撰“体系”为理，或以拾洋人、权威牙慧为理，学术也会丧失自己的精神境界，堕落为“玄学”。就学术与社会的关系而言，如果缺乏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将学术研究与服务现实简单对立，学术将不但会丧失发展的余地，而且也会逐渐丧失生存的空间。反之，如果将经世致用简单化、庸俗化，用应时之作取代理性而严谨的科学探索，学术就会堕落为“俗学”，也谈不上起码的尊严。

当代中国正面临着极其宝贵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挑战。当代中国学术也是如此。如何立基，何去何从，是每一个治学者都不能不面对的重大问题，岂可不深思而慎择之。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学者文库》付梓之际，僚草数言，权充书序。

高 翔

2010年4月于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院

自由·博爱·对话

——对于知识分子及其文学的思考(代序)

朱 竞 (《文艺争鸣》杂志社编审): 您对中国 20 世纪的印象是什么?

王兆胜: 20 世纪中国不乏希望之追求, 但却充满混乱、苦难和悲郁的沉重气氛, 它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如果打一个比方就是, 20 世纪中国虽然有阳光的朗照, 但也有黑夜将天空和大地笼罩之时, 而生活在其中的万物生灵饱受过磨难与不幸。这当然与世界的整体格局相关, 但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其文学也脱不了干系。试想, 在一个被战争风云、政治腐败、经济萧条、思想和文化复杂笼罩的整体格局中, 20 世纪中国的基调就已经确定了。以文学为例, 五四新文学确实为中国传统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从而建立起了具有相当现代性品格的中国文学, 但这一精神旨向在 20 世纪中国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和提高。当然, 就是五四新文学本身也存有不少局限, 而这些局限直接妨害了后来文学的健康成长。比如, 以西方价值体系为参照而导致的不加择取的“拿来主义”是片面的; 以过于偏激的打倒一切的姿态出现, 那必然丧失许多有价值的内容; 以冲突和斗争为核心的哲学必然造成对和谐、自由和真善美的表面化理解。其实, 20 世纪中国作家应该从全人类的角度, 从健全的思想文化的角度, 以建设者的身份来思考问题。若果真能够如此, 那么 20 世纪中国的思想、文化和文学可能会有所不同, 其中的一些残酷争斗、人格异化、功利实用等或许不会那么严重。

朱 竞: 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您怎样理解?

王兆胜: 知识分子精神肯定是存在的, 否则人类的生存、希望就是一

个问题。可能关键的还是一个理解问题，就是说“知识分子精神”到底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人们谈得比较多，也各有道理，但我总觉得流于表面化了。在我看来，知识分子精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自由。20世纪中国一直有一种声音呼吁“自由”，这是面对强大的专制压迫及其各种限制而言的，这是非常珍贵的。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可怕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就是“封建专制”，那种不让人“自由”的言论、行动，即按照自己的个性与喜好而生活的强大异化力量。问题是对自由的理解问题，自由并非绝对自由，更不是不加限制的。如果是绝对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与专制又有何区别？20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多人理解的自由是无限制的，那是缺乏正义、常识、公德、理性、美感等基本前提的。比如，法国的伏尔泰曾这样理解自由：我是自由的，但我完全赞同你自由发表你意见的权利。从这一方面看来，鲁迅对论敌梁实秋、林语堂等人的批评就含了话语霸权的专制色彩。今天作家的性自由、暴力自由描写也是缺乏公德和美感的。自由是一种美好的本性，但它的前提是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和感受，是具有规约、节制和自律这些前提的。

二是博爱。除了少数作家外，20世纪的大多数作家是缺乏博爱精神的，有的仅仅只是爱自己。博爱是一种神圣的境界，它不仅仅包括爱值得爱的人，也包括爱那些不值得爱的人，还包括天地自然中的所有动物和一草一木。一般人固然应该这样，而代表人类正义和良知的作家更应该是如此。作为一种文化哲学，它不应该相信战争、斗争能够给人类带来幸福，那是下策之下策；而真正的幸福只能来源于爱，那博大无边的爱。如果人类能够以互爱，能够以博爱为价值理想，那么许多战争和争斗恐怕就会避免。博爱的意义并不只在于通过博爱的手段解决问题，更在于建立一种文化价值信仰，使人类走出“强力文化”和“斗争文化”的暗影。有时我想，如果一个作家、一个知识分子相信乃至营造强力文化和斗争文化，那人类还有什么希望？

三是对话。这个问题与前两个问题直接相关，知识分子精神是以尊重他人人格、肯定他人存在价值的合理性、理解和向他人学习为前提的，没有此前提那他就不能算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智者，他能洞悉天地自然和社会人生的经纬，然后才能确立自己的基本立场，那就是作为个体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伟大及其渺小。对于前一点，我们容易理解，但对于后一点许多人是比较缺乏的。老庄说不敢为天下先，而现代人

却争做“第一”。在浩瀚无际的天地自然面前，谁能说“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本人尚且不能，那么谁还能够呢？然而，20世纪中国却不乏这样的人，而充分肯定对方存在的价值并以对话方式进行交流和沟通者更是不易找到。“我是正确的……”，这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言行的关键词。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对话者的核心词应该是：“我可能正确，……你也可能正确。”这样才能在对话中不断地靠近真理。

朱 竞：在您看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王兆胜：这是一个重大也是一个关键性问题。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肩负的担子非常沉重，这很像鲁迅说的：用肩膀扛起时代的闸门让年轻人过去。总体说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的最大责任是“载道”，为战争、政治、人生而奉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他们往往以主人翁的姿态直接参与社会现实及其人生的变革。从苦难深重的20世纪中国现实来说，这是对的，也是必要的，但从知识分子的角色来看又存在明显的问题。相对于政治家、经济学家、军人，知识分子更应该成为思想者，成为一个智者，他的立足点主要是对形而上问题进行思考。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与现实紧紧贴近的时候，忽略了对天地自然之道的关注，也忽略了对人性、博爱、自由等更重要问题的探讨。一句话，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它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向度，一种超越现实价值体系、更为广大、更为深远的思考。这就需要知识分子既要在社会的“中心”里思考现实人生，关注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又能以“边缘人”的心态，对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命运进行形而上的思考。

朱 竞：您最心仪的是哪一类型的知识分子？

王兆胜：我最喜欢有丈夫气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是世俗社会的凡夫俗子，而是天地育成的精华。这样的知识分子个性鲜明、率性而为，自由自在如一阵轻风一样飘过一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心地纯良、悲天悯人、包容万有、灵心浑发，如天地和大海一样能天容地载；这样的知识分子热爱生命、情感奔放，富有奇思妙想和惊人的创造性，但有时又是逍遥超脱、幽默闲适地作为人生的一个旁观者存在着的。像老子、庄子、陶渊明、苏东坡、袁中郎、林语堂是其代表。

朱 竞：您认为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王兆胜：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有两类：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现实参与派，二是以林语堂为代表的逍遥自由派。就如同琴瑟共鸣

一样，这两类人以其各自的个性和特色奏响了 20 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这一伟大的乐章。从共同性来说，这两类都是有血性的，也都是关注社会现实和追求自由的；但其重心、方式又有不同。对前一类来说，参与社会现实和身在中心的欲望较强，但心灵的自由和逍遥精神不够；对后一类来说，自由与逍遥被放在最显目的位置，旁观者的姿态更强烈一些，对社会现实的关爱不足。

我最喜爱鲁迅一类人对现实关注的深刻、执著与硬骨头精神，但不喜欢其强烈的内心冲突及其沉重与苦难感；我更心仪林语堂一类人对生命、人生和人性的理解，那是这样一种境界：既离开大地而时时关注着普通的民生苦乐，又能够在天地间自由翔飞，有着对生命和人生的大彻大悟。以往有人将林语堂（还有老庄等人）看成是消极遁世者，是不关注人生甚至厌倦了人生的人，这是相当错误的观点。其实，林语堂等人是反感于社会和政治争斗，而醉心于人生的，他们是一些美好的人生理想主义者。林语堂的基本哲学理路是：既然生命和人生的本质是悲剧式的，那么，我们就不要与命运抗争，也不要与万物为敌，而是顺应天地自然之道，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智慧，努力而又充分地创造和体会这美好的人生。所以，他提出人类可以“制天”，比如可以努力克服自然灾害；但决不能“逆天”，即违背天地自然规律而动。不过，与鲁迅相比，林语堂有些过于超然了，对社会人生的参与度不够。如果将鲁迅与林语堂比较，鲁迅是思想的强者，但不是人生的智者。

朱 竞：您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讲一件苦恼的事。

王兆胜：我出生于偏远穷苦的农村，父母都是农民，兄弟姐妹又多达 6 人，加之孕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最为不幸的是我 7 岁时母亲身患重病，12 岁那年她又命归黄泉，离我而去了。于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基本是被阴暗的色调笼罩和覆盖了。少年时最耻辱的一件事是：家里常常没有钱用，而父亲总是让我向别的人家错钱。尤其是我读书时用的钱基本上都是靠东挪西借，即使是借 10 块钱也不知要跑多少家。那时，知道我家没有偿还能力，很少有人愿意借钱给我们，我往往是空手而归。久而久之，这种耻辱感越积越重，就更不愿向人借钱了。但拗不过父亲的威逼，我还是必须去向人借钱。有一次，长久在人家门外踟躇，最后还是回家向父亲撒了谎，说人家根本没有钱。哪知道这次是父亲提前向人家说好了，结果一会儿父亲就将钱借了回来，因此，我被父亲

狠狠地打了一顿。向人家借钱这是我最感耻辱的事情，直到今天它仍如刀子般刻在我的灵魂深处。

这里值得一记的是，我的大哥为我借过不少钱，尤其是上了初中之后，我每有所需必向他求助！有时，今天回家，第二天就必须拿到钱返校，时间相当紧迫！大哥总是千方百计为我筹钱。那时，大哥已经成婚，他有钱时就直接给我，手头没有时他就代我借钱，再由他来还钱。有时，直到深夜才能借到钱，有时，大哥来不及进屋，就直接将钱从后窗缝隙塞给我。所以，当我升入初中之后，当“自尊”变得如高山一样不可动摇，大哥就成为我坚强的后盾——我再也不用失去“尊严”地向别人借钱，但是，我的“尊严”是大哥用他的“尊严”换来的。

除了吃穿方面的异常困难，母爱的缺乏更如沙漠缺水一般。我自己常想：一个人没了母亲，这个世界上真正属于他的东西可能就不多了。最令我苦恼的是，母亲生前没照过一张照片，唯一的一张画像也被父亲祭奠母亲时烧掉了。今天，我对母亲的思念只有靠记忆，而这种记忆却常常又是模糊一片，我靠什么和到哪里去追寻母亲那美丽的姿容呢？

朱 竞：您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国家、事业、朋友、孩子、爱人、大自然、文艺、科学还是别的什么）

王兆胜：自小开始一直以地瓜为食，一日三餐，很少例外。久而久之，胃口被败坏了，平时总是向上溢涨酸水，极其难受。到后来，宁可空肚子也不吃那“可恶”的地瓜了。直到读大学时，我才能吃饱肚子，才可以告别地瓜，甚至吃上各种美食，而且还可自己选择。当每月可以领到国家给我的22.5元伙食补贴，当我可以用这些钱买来馒头、包子、饺子、大米饭之类，一种幸福感和感恩之情油然而生。此时，我才知道在穷困之外还有一个富足世界。因为被苦难育成，所以今天感到非常满足和幸福。我喜爱世界上的一切美好事物，上面提到的我都喜爱。今天，我是以一种感恩戴德之情热爱着包裹我们的宇宙，热爱着我们赖以生活的星球以及它上面的万事万物。如果说我最挚爱的东西是什么，用一句话进行概括，那就是自由与感恩。当一个农民之子进入大学食堂，他眼前的情景是富家子难以理解和想象的：大米饭粒如同珠玉般闪着迷人的光泽，而雪白的馒头、包子和饺子里又无疑包裹着无限的满足、幸福、希望！当一个人有时间和自由自在地读书、思考、写作，为自己、为家庭、为国家、为人民、为人类，这是多么幸福而又有意义的生活状态啊！如果有了做我自己的自

由，有了一颗感念之心，你的世界就会成为冬日幸福的阳光，而别的所谓外在的金钱、权力、名誉、地位等都可以淡远了。

朱 竞：您对两性感情的自由和责任是怎样理解的？

王兆胜：两性感情是最令人感到困惑的问题，它中间往往充满着矛盾甚至悖论。我所理解的两性感情必须以彼此的互爱为基础，但又不推崇爱情至上。我认为，在选择你所爱的对象时，你是自由的；可一旦你选择了，你就要担起责任。因此，在两性感情上的关键有二：一是选择的自由；二是对责任的持久性担当。首先，你要有眼有珠地选择你所爱的对象，在志趣、人生观和性情方面彼此可以长久地互爱。其次，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与你的爱者平淡地生活。这里，我说的不是那种以浪漫的爱过家庭生活，因为那样是不会幸福的。真正结合后，以平常心、奉献心、责任心，再加上爱心去处理两性关系，这样才能使家庭固若金汤，爱河之水长流不息。在我看来，现代社会两性关系是有问题的：或是片面强调自由，说到底还是自私；或是缺乏常性和定性，难以以静制动；或是欲望膨胀，只得不失，殊不知在不断求“新”的取得之时，许多东西却丧失殆尽了。林语堂曾说，现代人的两性关系往往是：将爱情当饭吃而不是当点心吃。这样的婚姻不出毛病才怪呢！

朱 竞：对您影响最大的书和人是什么？能说说您和它的故事么？

王兆胜：书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它让我感到现实生活所没有的丰富多彩、宁静充实、安全可靠而又智慧有趣。书本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如今，手不释卷成为我幸福的生活方式。对我影响最大的中国书有：老子、庄子、孔子、孟子的著作，司马迁的《史记》，刘勰的《文心雕龙》，陶渊明、李白、白居易、苏东坡、李清照等人诗词，《西游记》和《红楼梦》，鲁迅、林语堂的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外国书有：《圣经》、古希腊悲喜剧，但丁的《神曲》，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莎士比亚的戏剧，日本的《源氏物语》，布丰的散文，卢梭的《忏悔录》，托尔斯泰的小说及文论，纪伯伦的散文，茨威格的小说。

我童年、少年的生活道路非常坎坷，进入青年后慢慢就比较顺利了，这很像是一条经过陡峭峡谷而来到开阔地带的河流，由峻急悲鸣而转入平缓从容。我常说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许多人的帮助，我的福气是常能得贵人相助。自小学到大学再到读硕士、博士，我都有幸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我能从农民之子不断求学离不开家人物质和精神的帮助；我的许多好友也

成为我前进的动力。但我感到一生中母亲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虽然与母亲共同生活只有 12 个年头，除了不懂事剩下的时间就更短了；但母亲给我的东西却太多太多。母亲非常勤劳辛苦，又非常爱孩子，为了能够将孩子养大成人，母亲将所有的担子都放在肩头。她一年白天上工总是几乎满勤，从不舍得休息；夜里却又做花边一直到深夜。还有，只要她能做的事从不耽误孩子的时间，做饭时经常是锅上一把锅下一把。在我的记忆里，母亲就像一头辛苦耕耘的牛，又像一个不断旋转的陀螺，直到生命结束才停下来休息。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母亲曾拉着儿女的手说：“如果我能活到你们有孩子的时候，6 个儿女的孩子我一个一个给你们看养。”当我自己真的有了孩子时，当我们夫妻一边工作一边艰难地抚养孩子时，我才知道父母的辛苦，也记起了少年时母亲曾对我们说过的那句话，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于是我也真正认识了母亲对儿女的好。可是，那时我的母亲已入土 20 年了。母亲自小就告诉我做事一定要认真。她曾在严寒的冬日，一边糊着被我弄破的纸窗上的小洞，一边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针大的窟窿瓮大的风。”母亲以此告诫我说，事情由小到大，脚下的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万不可贪大忘小，这样的人会一事无成的。后来，读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勿以恶小而为之”等句子，我才知道这些大道理其实很早母亲就用极其朴素的方法教过我。母亲临终那一刻，曾令她的 6 个子女向老天跪下，乞求神灵让她多活几年，因为没有显示，母亲最后留下这样两句话：“没有妈妈的孩子可千万不要站在别人家的门口，人穷志不短。”“妈妈死后，你们都不要害怕，自己的妈妈没什么可怕的。妈妈死后一定不让你们梦见我。”据邻居说，妈妈年轻时长得非常美丽，但我认为她的心灵更美。直到今天，已近不惑之年的我还将美丽的妈妈装在内心，那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最为重要的是，从妈妈那里我学会了怎样理解、尊重和保护女性，也明白了女性的伟大力量。今天，我衡量一个男人最简单和朴素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女性的态度如何。

朱 竞：您是否有成功感和成就感？

王兆胜：有。但这种成功感和成就感并不是用金钱、权力、地位和名声来衡量的。我现在写过不少书和文章，家庭和睦安宁、孩子聪明可爱、朋友情深意长、工作顺心如意，这是成功的。但我觉得自己最大的成功是身心的健康与快乐，一种知足常乐、宁静守一、宠辱皆忘的平常之心。生

命的流水转瞬即逝，这对任何人都是这样。在我的理解，饱满而有意味的人生不在物质感官的享乐，也不在头顶的光环，更不在他人的褒贬和是非评说，而在于内在的精神高度及幸福感受程度。这就好像蜡炬成灰泪始干，但它已经发出了光和热是一样的。

朱 竞：您毕业于哪所大学？哪个专业？在您看来，目前大学教育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王兆胜：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均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目前中国大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八股式教学为主，学生没有自由读书的时间及其指导，自学能力和创造性都比较差。审美教育完全被知识充塞所代替。

朱 竞：您作为一位博士生（硕士生）导师，在您看来，要带好您的学生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王兆胜：我认为，导师带好学生的关键有四点：一是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给学生开出经典必读书目，指导学生博学和精专的方法；二是让学生自由地读书、思考和写作；三是与学生进行对话，形成讨论的气氛，以提高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为人师表，在人生观、生活态度、审美趣味等方面提高学生的境界和品位。导师最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过于严格按照自己的思路、观点要求学生成为自己的复制品，这必然造成学生缺乏创造性与突破的胆气。二是完全“放羊”式的随意而为，这样学生不知依归，无所适从。三是重学问提高而忽略人品和人格提升。事实上，学问和人品、人格是相生相长、不可分离的。

朱 竞：在您看来，当前的文学专业博士生（或硕士生）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兆胜：不喜爱读书，书读得既不广博，又不专深。尤其是对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经典没有兴趣，下的工夫也远远不够。过于信赖西方的价值观念，于是在概念、思维方法、理论体系以及语言表述和文风等方面都有西化的倾向，给人以生搬硬套、玩弄新概念与新辞藻和消化不良的感觉。还有，不少人的的人文精神比较淡薄，个人主义思想比较突出，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不够，缺乏更为博大和深厚的情怀。

朱 竞：您认为当前的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存在什么问题？

王兆胜：不认真对待，流于形式，水平明显下降。由于准备不够充

分，又缺乏足够的研究，于是仓促上阵，罗列资料，述多论少，抄袭现象严重，更缺乏独立的创新意识。还有，因为进来容易出去更容易，所以当前的博士（硕士）毕业论文整体上水平不高。

朱 竞：您是否认为我国的大学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存在着体制问题？

王兆胜：体制确实是中国大学和研究生教育的根本性问题。如果说打倒“四人帮”后中国恢复高考和高校教育制度是一个创举，那么现在如何进行改革以便更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就是一个非做不可的工作了。

朱 竞：据统计，大学里的研究生有百分之七十是女生，这是怎么回事？

王兆胜：这里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研究生考试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弊端可能是主要的。试想，如果将“知识性”作为人才的主要衡量标准，那么女研究生恐怕总比男研究生多。

朱 竞：学校教育对您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

王兆胜：学校教育使我有比较系统的知识体系及其结构，也确立了与人合作的团结友爱精神。但是，书读得太少，尤其过于重视现代当代作品，而对中西古代经典作品重视得很不够。另外，对政治意识和道德思想进行了硬性的灌输，而人生、人性和审美的教育却被严重地忽略了，这就容易导致长期以来对人生和人性的简单化理解。如果学校能够提供自由读书（尤其阅读经典）的时空，能够有更多名师给予更好的读书和做人的方法，能够在读了万卷书后再行万里路，那今天我就会有更大的提高。现在，告别自小学到博士研究生的全过程后，我尽管获益不少，但又不得不在读书、了解社会和人生诸方面重新补课。

朱 竞：能不能举出你最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和中国当代批评家？

王兆胜：我没有最推崇的中国当代作家，因为他们在学养、境界、品位和创造性等方面都不能与中国古代和西方经典作家，甚至也不能与中国现代作家相比。如果孤立地看来，中国当代作家也确实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放在更大的背景上来看，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比较喜欢的中国当代作家有：孙犁、汪曾祺、王鼎钧、林非、张晓风、董桥、史铁生、贾平凹、张炜、张抗抗、鲍尔吉·原野、王开岭等。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是没有独立性品格的，批评家不是跟在作品后面一味解释，就是捧与杀，有的甚至不读作品而自言自语或者胡说八道。

朱 竞：您最推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哪几部？

王兆胜：较好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孙犁的散文、汪曾祺的短篇小说、王鼎钧的散文、白先勇的小说《游园惊梦》、张晓风的散文、董桥的散文、陈忠实小说《白鹿原》、贾平凹的散文、张炜的小说《古船》和散文、林非的散文、史铁生的散文。

朱 竞：您认为对于一个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来说，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王兆胜：有六点是主要的：境界、品位、才气、深度、创造性和表现力。一个伟大的作家和批评家除了学养积累外，最重要的是其境界和资质，那种有品质的饱满的才情。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庄子、刘勰、李白、苏东坡、曹雪芹和莎士比亚、卢梭、普希金、尼采等人的作品时，就能充分体会这一点。那不是挤牙膏式的写作，而是江河涌流，行云流水。深度对一个作家和批评家也非常重要，这往往直接表现在对生活的独到理解上。如茨威格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个小时》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小说对生活的透视多么深入，其深刻性读之简直令人心颤。创造性是作家和批评家最重要的素质，没有创造性一个作家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意义。像曹雪芹能够在吸收《金瓶梅》等作品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创新，就很能说明问题。还有表现力的问题。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和茨威格的小说表现得都是那样精当奥妙，其细如发丝的情感流动将读者的心灵紧紧地吸附着，令你不得不感动涕零，拍案叫绝！

朱 竞：您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兆胜：主要问题非常之多，一言难尽！概括起来：一是对文学缺乏真诚，更不是整个生命的投入。许多作家是为生活、金钱、名声、地位而创作的，他们的作品当然不会感人，也没有意思。二是境界、格调和品位不高，充满着世俗性和腐朽性。三是文化选择的迷失，这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等关系的处理上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张承志不加选择地高扬荆轲精神，缺乏现代意识的烛照，就是这样。四是才分和学养都不充足，而内心的品性修炼更是不够。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充斥着更多的虚假、浮躁、短见、粗俗、狂妄，许多作品不忍卒读。

朱 竞：您为什么要从事文学研究？

王兆胜：在当今社会中，可能最接近心灵及其情感的就是文学和艺术。这里充满个性、真诚、善良、美好、慈爱、想象力、深刻性和趣味，